

凝视与被凝视：《乡村医生》的创作心理和现代性建构

文 / 唐淼昱



国内外研究者一直尝试从不同角度来解析卡夫卡，《乡村医生》作为卡夫卡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本文延续前人研究，选取文本中未为人关注过的多重凝视视角进行分析，意在通过对卡夫卡创作心理及其现代性建构的方式作初步探讨。

一、窗外的马：异己力量的侵略

小说中的这位乡村医生在深夜需要去看一个十英里外的重病病人，他急于出诊却没有马匹，好在猪圈里突然出现的两匹健壮的马解了燃眉之急，一霎时就把医生带到了病患家里。令人不解的是，当马将他带到目的地之后，关于马的描写与叙述并没有停止，医生看病的事件里，卡夫卡多次写到窗外的马对屋内的关注：

第一次，当医生进入病患家准备为病人看病时，两匹马“不知用什么方法松开了缰绳，我也不知道它们怎样从外面把窗户顶开的；每一匹马都从一扇窗户探进头来注视着病人，对于这家人的叫喊毫不在乎”，让医生产生一种“我必须马上就回去”的焦虑情绪。

第二次，当医生走到病人的床边，一匹马“向天花板高

声嘶叫”。

第三次，医生认为病人并没有病，病人的家属对于这个结果深感失望，于是医生再次向病人走去，这时两匹马“同时嘶叫起来”，就像是上帝“特意安排来帮助我检查病人的”。

第四次，医生发现了病人的伤口，他被脱去衣服，与病人躺在一起，此时马依然在场：“忽隐忽现的马头在洞开的窗户前晃动”。

在这里马的不断出现不会是偶然，马的目光严密监视医生的一举一动；同时马一直在试图冲破房屋的阻隔来控制医生的行动，破坏了空间上的界线，给人以压迫感和不安全感。如果说房子是医生的自我世界，马则是强势侵入者，以不容置疑的姿态介入医生的精神。不仅如此，每一扇窗户里都探进一个马头，可见侵入是无孔不入的。

这种书写与卡夫卡本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卡夫卡在家庭里承受着强权与威压，他的至交好友勃罗德曾在《卡夫卡传》中详细介绍了卡夫卡的家庭情况——父亲常常固执地用暴力来强加教育理念给卡夫卡，但伴随着剑拔弩张的父子关系，卡夫卡也在父亲绝对家庭权威之下建立起对父亲地位的认同。《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向父亲袒露自己的写作多与父亲有关；《判决》中的父亲是主人公心里的最高法官，常常监视儿子的一举一动……裹挟“暴君”色彩的父亲形象随着卡夫卡创作渐趋成熟而成为“秩序”、“法则”的符号。父权与神权实际上是一体的，卡夫卡的父亲是卡夫卡童年生活的教条，发挥着像宗教教义一样的禁锢作用，这种禁锢延伸到他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过，对于父亲权威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卡夫卡的自我完全消失了，相反，他“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逃出樊笼的想法从不曾远离卡夫卡。

卡夫卡成长于奥匈帝国政治统治下的捷克，作为一个夹在日耳曼人和捷克人之间的犹太人，既要受到排犹情绪的排斥，又不能被捷克民族所接纳，他们通常被冠以“老鼠与寄生虫”“发育不良、举止懦弱的病态者”等侮辱性头衔，社

会地位卑下。从心理上来说，这些第一代受到同化的犹太人一方面急于摆脱犹太标签、加入帝国公民群体，另一方面却难以割舍犹太民族的信仰。荣格认为“无意识”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历史上，作为一个漂泊无定的民族，犹太人有自己的、与所处环境难以相融的群体价值观念与民族性格，而长期的“流浪”史也给犹太民族留下了无助边缘人式的“集体无意识”。

社会环境里“他者”的身份给卡夫卡带来的是自卑与自闭，他曾直言自己早在儿童时期就“感受到自己是犹太人”。卡夫卡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在“被看”，既无法脱离身上的犹太性，又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早期生涯里，卡夫卡对于犹太教的态度非常消极，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父亲称：“我不理解，您怎么可以拿您那空洞的犹太教教义来责备我，说我没有努力去践行类似的空洞的犹太教教义。就我所见，那的确是一种空洞洞的东西，是一种娱乐——连娱乐都谈不上。”长期处在异己力量的侵略和压迫下，又难以找到接纳自我的落脚点，体现在作品中就是马在窗外的时刻在场，可以用“凝视”加以注解。在一个封闭的房子里，马通过观看动作使之成为观者、获得主体地位，无所不在的精神压力与纠结痛苦就像抓住一切空洞侵入的马头一样，长久地困扰着卡夫卡的精神世界。

二、恐怖的房子：隐匿的规训权力

小说里乡村医生所诊治病人的家及其家人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

第一，对房子环境的描写。医生刚一进门，就感觉到“病人房间里的空气几乎无法呼吸”，“炉子没人管可是冒着烟”，这样的描写为这座房子制造了压抑的气氛。

第二，对病人家人的描写。从出场开始，病人的家人就处于强势地位：“我几乎是被他们从车里抬出来的”、“他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我一句也听不清楚”，本应作为“拯救者”的医生在这家人的蛮力和喧闹下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当他正式进入这家的地盘后，病人一家给人的不安全感愈甚：他们全程都参与了医生的诊疗，只不过有时是付诸了直接的行动，有时这种介入则是沉默不语地发生的。比如医生第一次诊断前，病人的父亲“弯腰向前默默地站着”，虽然不出一语却实实在在地关注着医生的诊疗情况，而姐姐则搬来一张椅子给医生放手提包，这促使他从包里拿出了医疗器械（一个镊子），病人的母亲招呼他到床边去，医生“顺从”了，这才会有第一次听胸诊断；在医生第一次检查完认为没有问题之后，这家人的反应居然是十分失望，母亲含着泪看着医生，期望他可以再检查一次并且真的能查出什么病来，姐姐更是



“摇晃着一条满是血污的毛巾”，隐晦地暗示医生这个孩子身上存在伤口，于是医生才进行了第二次检查。不难发现，医生的行动受到了这家人的引导和控制，虽然他们并没有用暴力的手段去强迫医生找出孩子身上的伤口，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发生作用。

福柯的微分权力理论认为，权力并不仅仅是分明的上下两层，而是多样的、细微的，存在许许多多主动被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提出，“规训”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此处的权力并不单单指国家机器的权力，而是指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限延展与渗透、影响的力量。严格的监视正是规训权力重要的实施手段，就像在学校、工厂、监狱等等地点都存在监视点，这种监视无时间限制，在这里我们可以部分地借用他的理论来分析病人家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在古代时，君王作为权力的象征是可见的，而现代权力通过监视持续不断地发挥效应，它具有匿名性和某种“物理”性，通过“观看”也即凝视这一行为，《乡村医生》中的医生被病人的家属观察与裹挟，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可以被家属一行人“看见”，在诊断过程里，他被客体化为权力介入的对象，身体动作都受到潜在的操控——尽管这些家属并未开口以逼迫性的语言强迫他，权力并不可见，而是以一种隐匿的姿态施展作用。“规训”的结果和目的表现在这篇小说中就是医生对孩子的两次诊断，并最终“不负众望”地找到了家属们所期盼在孩子身上找到的花朵般的伤口。房子里家属的凝视，或者说监视，使医生工具化了，医生失去了“救世主”的权威。

在看病过程的后半段，卡夫卡给予了隐匿的权力一个较为明显的出场机会——病人的家属与村里的长者一起来到。长者的地位比这一家人显然要高，说明权力是分层级的。合唱队唱着单调的歌词，歌词内容直白得令人惊悚：“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这些人脱掉了医生的衣服，抱住头、拖住脚，把他按倒在床上，暴力的手法完全剥夺了医生作为一个主体本该具有的权力。

三、伤口的发现：转换与现代性

萨特的“注视”说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但人依然会受到外力的羁绊，弱者会在他人的注视下出现自我的异化，将他人的注视内化，最终丧失人的主体性。作品里的乡村医生并非一直处于“被看”的被动地位，在他给病人看病时，出现了“看”与“被看”的转换。

医生为病人看病的过程透露着敷衍了事，起先他拿出一把小镊子，但他并没把这把镊子来进行什么检查，只不过是放在烛光下看了看就又把它的放回去了。然后他听了听孩子的胸口，简单地下了这孩子并没有病的结论，并加上一个只是咖啡喝多了的随便理由。离开时，病人家属的恳切又迫使医生重新审视病人的身体，并且在病人身上找到了一处花朵般的伤口。

在福柯看来，医生的任何诊疗方式都会随着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而发生变迁，凝视变成了找出病因的钥匙，检查使病人在医生面前要处于弱势地位。临床医生享有“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权力，病人的身体只是医生目光注视下的一个可见“物品”、一个被征服、被认识的考察对象。这也就可以解释医生为何如此敷衍——对一个物品需要用什么样的心呢？

原作中详细描写了孩子伤口的形态：“在他身体的右侧靠近胯骨的地方，有个手掌那么大的溃烂伤口。玫瑰红色，但各处深浅不一，中间底下颜色最深四周边上颜色较浅，呈微小的颗粒状，伤口里不时出现凝结的血块，好像是矿山上的露天矿。这是从远处看去。如果近看的话情况就更加严重。谁看了这种情形会不惊讶地发出唏嘘之声呢？和我的小手指一样粗一样长的蛆虫它们自己的身子是玫瑰红色，同时又沾上了血污，正用它们白色的小头和许多小脚从伤口深处蠕动着爬向亮处。”

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完全可以说明医生的凝视带着怎样的色彩：客观、仔细、穿透一切，目光具有了现代医疗器械的剖析功能，在冷静观看与找出差异的过程里，病人身上的病痛就像花圃里碍事且需要除去的杂草。乡村医生并不真正在乎病人的世界，因此他匆匆下了“多喝了咖啡”的诊断。这是现代性焦虑的典型特征。

同时，这段观感甚至令读者感觉恶心的描写也在传达一种信号：医生凝视着病人的伤口时，实际上也被病人的身体所凝视了。血污里的蛆虫以极具活力的姿态爬“出”而非爬“入”，强势侵入了医生的世界，给医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不适影响，这寓意着病症的转换：病人身体上的病症通过对医生的反作用注视施加到医生身上，最后变成了医生精神上的病症。文本中后来写到医生被迫与病人躺在一起以达到治疗

的目的，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隐喻，即本来医治病人的医生也变成了病人，只是这种病并不体现在肉体上，而关乎心灵。

此外，居于弱势地位的病人将自己身体上隐秘的疾病隐藏起来，试图反抗视觉领域里的监视、躲避医学探究的注视，但面对医生的凝视，这往往不会奏效——医生，尤其是现代医生，还是能以完全客观的眼睛揭开病人的遮挡、彻底粉碎被看者的抵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开始“我”并没有发现孩子身上一个如此大的伤口，之后又轻易发现了孩子身上的创伤，卡夫卡通过这样不合理的、猛然出现的情节完成现代性建构。

四、结语

《乡村医生》结尾，医生只能光着身子流浪在雪地上，如果说医生“我”是卡夫卡的人格投射，那么离开病患家其实象征着一种逃离，逃离那座房子里的凝视与焦虑。

可是逃离的结果是什么？逃出这间房子，外面依然有更大的、更残酷的风雪世界，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既无力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那些手脚健康、无病无灾的所谓病人也不会帮助“我”。医生所面临的压迫和异化正是卡夫卡人生的缩影，也是现代社会下被隐匿的庞大权力所监视的人类的缩影。在雪地上到处流浪的乡村医生，也是千千万万个到处流浪的人类灵魂。

【参考文献】

- [1] 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选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95.
- [2] 斯特·帕维尔, 陈琳, 译. 理性的梦魇: 弗兰茨·卡夫卡 [M]. 法律出版社, 2013:44-45.
- [3] 李晔梦. 同化主义语境下欧洲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以卡夫卡为个案的考察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50(04):138-145.
- [4] 罗纳德·海曼. 卡夫卡传 [M]. 作家出版社, 1988:28.
- [5] 马克斯·勃罗德. 卡夫卡传 [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9.
- [6] 宁宏瑞. 失语的“我”——试析卡夫卡作品《乡村医生》中的三次话语权的剥夺 [J]. 大众文艺, 2020(22):33-34.
- [7] 田孝敏. 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微观权力理论 [D]. 中央民族大学, 2016.
- [8]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 [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9]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10] 朱晓兰. “凝视”理论研究 [D]. 南京大学, 2011.

【作者简介】

唐森昱(2001—), 女, 汉族, 湖南湘潭人, 南开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世界文学。